



关键时刻

华莱士·布劳克威主编

张焱 金嘉辛 高新祥译





关键时刻

华莱士·布劳克威主编

张 焱 金嘉辛 高新祥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朱志焱

封面设计：叶雨

Wallace Brokway
HIGH MOMENT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关键时刻

GUANJIAN SHIKE

(美)华莱士·布劳克威主编

张焱 金嘉辛 高新祥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03,000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

书号11002·678 定价1.95元

目 录

译者前言..... (1)

苏格拉底..... 欧文·埃德曼(3)

恺撒..... 威尔·杜兰特(22)

圣保罗..... 皮埃尔·范帕森(52)

贞德..... 温德赫姆·刘易斯(82)

米开朗基罗..... 弗朗西斯·亨利·泰勒(108)

乔治·华盛顿..... 道格拉斯·弗里曼(124)

吉本..... 路易斯·克罗南贝格(145)

托马斯·杰斐逊..... 克劳德·鲍尔斯(171)

歌德..... 安德烈·莫洛瓦(196)

拿破仑..... C. S. 福雷斯特(213)

贝多芬..... 欧内斯特·纽曼(234)

林肯..... 本杰明·托马斯(250)

圣雄甘地..... 贝特兰德·拉塞尔(272)

阿道夫·希特勒..... 休·特雷弗·罗珀(286)

罗斯福..... 塞缪尔·罗森曼(309)

译者前言

本书是一部外国名人评传集，介绍了十五位历史人物，其中有民族英雄、国家元首、军事家、哲人、画家、音乐大师……也有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些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其成就有大有小，作用有正有反，但多数是功业彪炳，名重一时，或造福人民，或坚持真理，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先进人物。

传记有种种写法，尤其是写名人评传。原书编者规定了一个写传记的准则，就是要写人物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或“转折点”。他说：“在每个伟大人物的一生中，都有一个维系其成败得失的时刻，在此紧要关头作出的行为抉择，代表了他所能采取的最高水平的行为。”换句话说，本书所写的人物历史，都是截取其最能体现人物本质及特征的一段；由此再敷衍展开，寓论断于叙事，对人物作出中肯的评价，因而最能令人信服，也最能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本书所收十五篇评传的作者，都是对所写人物有专门研究，并在有关学科方面造诣高深的学者。各人的写作风格尽管不同，但文字优美，富有情趣，立论精辟，通俗易

懂，是他们所写各篇评传的共同特点。

因为本书写法是着眼于分析各个历史人物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所以对他们最终作出的评价很可能与传统的结论不尽一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但是，各篇评传既然出自西方学者之手，就不可避免地也会包含不少与我们抵触的历史观点，对此将由读者自己分析和鉴别了。

本书中的多数译文都经过详细校订。参加译文校订工作的有张焱、王子和、胡壮麟、陈亮、卢珮文、祝彦等同志。另外，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几位同志从专业角度审阅了有关篇章；高年生、孙企英、王子雄、齐清、陈文绮、黄荷清等同志，也对本书翻译工作的完成给予了不同方式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总谨表谢意。

苏格拉底

欧文·埃德曼

有时候，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次危机同时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用这个比喻的说法来形容苏格拉底一生中的关键时刻，也许不能算过于牵强；当时，他面临最后的抉择，并且作出了无可挽回的选择——因为他不得不作出。那次危机是对他的审讯，他的选择则是服从法官们的判决。指控他的罪名是不信国教之神，伪造新神和腐蚀青年。但是，实际暗指他的罪名比这要深重得多，严重得多，人们指控他的不仅是雅典公众而且是任何时候的公众拿来反对哲学家们的那些罪名，或者是公众隐约感到是应当拿来反对哲学家的那些起诉^①。人们指控苏格拉底按理性生活，腐蚀青年，因为他一直用言教和身教劝说青年仿效他的榜样。

苏格拉底有机会逃走，但他放弃了，却去服从雅典法律这条路。然而，他深为崇敬的事业已经完全超出公民职责的范围。他选择的是完成必须绝对履行的使命，就是必须按理性生活，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有什么诱惑要他去干相反的事情。他选择了为自己辩护，虽然这种辩护被说

成是认罪，他却并没有认罪，他既用论据又用过去生活中的事例证明自己的言行是正当的。他是理性生活和被指称为理性的危险的化身的辩护律师。因为受审讯的是理性（苏格拉底很懂理性）和他本人。他是为思想自由原则，为思想本身献身的第一个烈士。他把思想放在高于个人舒适、安乐以及名誉之上。

以上所说苏格拉底受到审讯，他放弃外逃机会，他从容镇定直到最后被处死，这一切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在柏拉图著作中看到的苏格拉底基本上报道准确^②，他接受审讯以及在狱中的情景显示并结束了一种久已献身给严格探索万物的究竟，尤其是真正的美德的生涯。在那些最后的日子，在那些最后的时刻里，苏格拉底要以理性战胜舆论，以尽责战胜安乐。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瞬。因为这是第一次挑战地证实了人的理智具有至高无上的自主力。

应当明白，苏格拉底接受审判不但是为了保全生命，而且是为了他的生活方式。了解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当时的基本争执点是什么？老是争论不休的基本分歧又在哪里？为什么苏格拉底的生和死在那些珍视理性生活的人眼里已经成为一个道德说教的寓言？因为不管苏格拉底的谦虚否认（象所有否认自己罪名的辩护词一样，至少有一部分令法官们啼笑皆非），他却分明感觉到他的受审与被判决，对人类来说确实具有道德说教的意义，他宣称，受过考查的生活才是值得活下去的生活。他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

知识，知识的唯一目标则是美德，而美德是只有理性才能揭示的^③。除非不腐蚀，不扰乱他的心灵，他决不能接受任何其他拯救，他也决不按其他标准生活下去。

正是这种性格使苏格拉底成了历史上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对他来说，过理性生活乃是一种义务，合理性乃是一种职责，而职责是受理性指挥的。在苏格拉底以后也有不少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奉行理性，但他们的理性有时候几乎来自对感觉得到的东西的感知。例如在十八世纪，大卫·休谟以及他的许多同时代的人都求助于常识。但是他们却没有象苏格拉底那样，把理性与良心结合起来。对于休谟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理性不过是文明绅士的标记而已；而按苏格拉底的想法，理性是和烈士的献身和圣人的无私结合在一起的。别人控告他不信神，但是在苏格拉底的言论中却有着笃信宗教者的明显印记：因为他认为，追求美德生活势必带上神的色彩。

这里有一个并非与正题有关的问题。这就是关于苏格拉底这个人，有多少成分只是柏拉图的创造。虽然在这方面，叙事力求真实的历史学家色诺芬已经证实了这位哲学家兼诗人的叙述，这一点对我们很有用。有根据相信，我们在柏拉图对话中见到的苏格拉底和雅典人见到的穿着简朴，赤着双脚行走在雅典街上的苏格拉底是很为一致的。不过即使柏拉图笔下的形象同真人真事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因为正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一直影响着人类的想象力，就如同《福音书》中的耶稣形象一样，始终成为人类想

象的中心，代代相传，历经两千年而不朽。

柏拉图对话中有很多问答恐怕只有专攻哲学的人才会有兴趣，但是《申辩篇》、《克里托篇》和《斐多篇》^④，几乎象《福音书》一样会继续流传下去（虽然在《斐多篇》中费了很多力气谈灵魂不灭的问题，却没有说什么说服力）。它们记叙了一个人，其生时是严肃与美好，其死亡是庄严与高尚——为一种理想而殉身。类似的例子是耶稣，他在后来人类道德史上起过极大的作用。他活着的时候也象苏格拉底那样生活，死去的时候也象苏格拉底那样泰然处之。苏格拉底一生的道路，也如同耶稣一生的道路一样，既是一种痛苦又是一种解脱。两人又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提示人们怎样生活，怎样过清清白白的生活。诚然，象耶稣一样，苏格拉底也平静地接受即将来临的死亡，在《斐多篇》中他建议哲学家应当乐于去死，因为这样就可以从尘世苦乐的纷繁错乱中逃脱出去。苏格拉底提示人们，如果唯一美好的生活就是过理性的生活，那么不如让肉体完全超脱活着的尘世为好。

正如论及耶稣一样，人们不禁要问：苏格拉底式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效仿苏格拉底”又是什么样子？

应该效法他的使命，而“使命”一词是经过考虑的，因为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他设想自己有这样的“使命”。怎样生活才象苏格拉底？有关他的生平事实不多，记述更少。到法庭受审时，他已是七十高龄。大约有三十年之久，他深为雅典人所知。他的父亲是个石匠，但苏格拉底有点象懒汉——虽则是个有灵感的懒汉——无尽止的

谈话，尤其是提不完的问题。

照苏格拉底那样生活，遵循他的“使命”，就是要顺着理性指引的方向前进，如果有必要，即使是死，也要勇往直前。人应当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认识自我，也就是说，去了解自己的心灵，去探究自己所说的事物，自己所想的事物，自己所追求的事物的含义。人应当经常不断地提出问题，这不是为了搞乱谈话对方的思想，也不是为了搞乱自己，而是为了探求出能够经受更多怀疑更多混乱的考验的原则；人应当去求知，真正地去求知、去掌握关于真正现实的可靠知识，直到最后掌握渗透于真实之中的，并且按照苏格拉底的想法，同真实一致的那种美德的知识。这样，苏格拉底就创立了一种宗教，然而是一种世俗的理性宗教。他是这个宗教的第一个殉难者，他的死如同耶稣一样，不仅在历史上能始终屹立，而且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永恒的绝对道德形象，动摇的人性会追求他，仿效他。

对一个人的法律控告，法律审讯，往往只有根据这个人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才能够理解。苏格拉底的受审并非命里注定要出名的，这个案子在当时就很轰动，并且苏格拉底已经是一个知名而引人注目的人。他成了阿里斯多芬尼^⑤和其他作家笔下讽刺的对象，这就使他的声望够大的了。他在雅典民主派中有一些好朋友，其中有几个头面人物还打算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斯巴达。这个时期的纨绔子弟喜欢追随在他左右。和他谈话，听他向他们的长老、政治家和将军们提出一些诱导性的、挖苦的问题。

他们爱听他把那些流行一时的政治和雄辩术教师，也就是那些智者学派的人向上钩。这些好诡辩的智者，在一种人数少到足以使公开演说成为政治发迹的大才的政治社会中，是被广为录用的人^⑥。从体面的舆论观点来看，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富裕过。虽然他应该是个石匠，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实际干过这行手艺。他没有什么收入，却宁愿闲着，虽然这种悠闲意味着穷困。他结婚很晚，据说不大呆在家里，虽然詹蒂皮也许未必就象别人描写的那样泼辣和蛮不讲理（柏拉图笔下肯定没有这样写她），但是苏格拉底象大多数聪明的希腊人一样，喜欢生活在男子群里^⑦。

在受到审讯之前，苏格拉底早就是一位有名的人物了，没有理由认为对他的控告就不能在上一个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几乎任何时候提出。要说他腐蚀青年，那已经腐蚀很久了。如果说他不信神，那么早在这次审讯之前，阿里斯多芬尼在《云》一剧中把他同那些自然科学哲学家混淆起来，已经指责他崇拜太阳、云和自然力。而在他的青年时代，诚如他在《斐多篇》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曾经有兴趣研究我们现在所称的物质自然界^⑧。

总之，早在审讯之前，他就一直明确地使自己成为正统派讨厌的人了。在《申辩篇》中他告诉我们，德尔斐城发布神谕^⑨的祭司曾经告诉他说，他是雅典最聪明的人。他还告诉我们，他很谦虚，不敢相信此言，但是出于对神的虔敬，也不能怀疑神谕。通过向雅典街头的人提问题，他发现他们懂得并不比他多^⑩。将军们、诗人、政治家，

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而苏格拉底则至少还知道一件事，即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由此而言，至少神谕还是对的，称他为聪明人，也许指的就是这一细节^①。所以当时有好几年，苏格拉底一直在雅典各处巡游，不断向人提出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他会问那位有名的诡辩学大师毕达哥拉斯，他以教人为业的这点本领是什么？他又会问尤赛弗罗^②：你打算告发自己父亲，因为他杀死了一名家奴，请问这算什么孝顺？在《理想国》中曾提到有一次在富有的瑟弗勒斯家里，苏格拉底当众提问：什么是正义？残酷无情的特拉西迈彻斯回答说，正义就是强者的权利。苏格拉底表示不能接受。他不只是向踌躇满志者指出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问题，他也不只是向年长者和常规教条提出质疑，他还常常向年轻人提出机智的反复追问，而且所提的都是比政治更微妙，更本质，更接近本原的问题。他会叫住两个正在运动场上锻炼的年轻人（都是男孩子），问问他俩是不是朋友，然后很有礼貌地使他们明白，他们并不能对友谊下一个定义，因此也就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朋友”这个词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曾被人介绍与西埃蒂塔斯认识，这是位和他自己一样既在哲学方面有天才，又长得很丑的人，他让这位年轻人明白，不仅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成问题，就连搞清什么叫“求知”也不容易。

显然，过人的才智在这里起了作用；当时正处在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之后，社会很不安定，由三十僭主实行专政。苏格拉底有几位年轻的朋友——虽然还不是内层圈子里最接

近的追随者——曾企图把雅典出卖给斯巴达^⑭，这件事已经完全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当时长期被人怀疑为“腐蚀青年”。如果说使青年对当时公认的价值观持批评态度就算是腐蚀的话，那么他确实是一直在这样做的。至于说到伪造新神和不信国教之神，那在控告词里更可以找到不少似是而非的根据。因为苏格拉底早年喜欢对宇宙作出我们现在称之为自然科学的解释。因此虽然他对官定之神表示敬意，而且有证据表明他遵循——甚至重视——宗教仪式，显然他的确并没有把奥林匹斯山神教的诸神当成一回事。

雅典公众早就要找苏格拉底算账了，应当记住，实际审讯他的正是雅典公众的代表人物。陪审团由与他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计有五百多人，而不是通常的十二人。审讯有点象意见听取会，不大象有各种专门法律手段来保护被告的现代意义的法律审讯。苏格拉底充当自己的辩护人，被告是不能由律师代为辩护的。“陪审团”一大堆人，象一群听众在听他演讲。苏格拉底是在对着一群已经很了解他的人讲话。他在答复他们，并且他应对他们作的答辩比原告的起诉还要多。原告是制革工人安尼塔斯，不大出名的悲剧诗人麦利塔斯和有名的演说家勒昂。他回答的问题包括有关他的生平，他在雅典的经历。他在雅典住了很长时间，可能比陪审团大多数成员能想得起来的还要长。他的辩护词不是什么悔过书，而是一篇自辩书。

苏格拉底不但是五百个听众都熟悉的，他还清楚地表

明，他们也完全了解他是什么人和他干过些什么。他感到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使命的内容又包含些什么，他分明感觉到这些已经被胡乱猜测搞得误解很大。他是这样说的：“神命令我去完成哲学家的使命，去检察自己，去检察别人。”如果他却“因为贪生怕死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那样一来，他倒真正应当被法庭传讯，被告发不信有神之罪了。苏格拉底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对此他回答说，他的一生经历都是由神指挥的，神命令他向年长者中的沾沾自满者盘问，向头脑简单思想混乱的年轻人中的狂妄自大者盘问。就是把他无罪释放或从轻发落，要叫他从此不再向那些人提问题，他也办不到^⑬。因为，他的一句名言表明，他是神派他来做雅典城邦的牛虻的。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早就宣称，他心中有一种灵异的声音时常跟他说话，并常常警告他不要干某些事情，在他生活的关键时刻，叫他不要参与政治：

“有些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总是私下到处奔走向人提出忠告，忙着关心这个，关心那个，而不敢公然走到社会上向国家进一忠言？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曾经在许多地方多次听我讲到，有神灵降临到我的心间，我想，这就是麦利塔斯在诉状里所攻击和嘲笑的神。这种神灵乃是一种声音，在我幼年时就开始来到了；每次来临它总是阻止我所想做的事，从不令我去干。这就是为什么我没当政治家的原因。”

他还说，要是当上了政治家，他恐怕早就死了。他采

取了另一种方式，为雅典人的幸福作些贡献，确切地说，作些改善工作。结果证明，这种方式终于也并不安全。他警告听众们：

“如果你们杀了我，你们就不容易另找一个象我一样的继承人，用可笑的形象化比喻说，这个继承人是只牛虻，是神派来附在城邦身上的，而城邦则是一匹伟大而高贵的马，它由于肥大和缺乏活力现在走路有些慢吞吞了。我就是神派来附着在城邦身上的那只牛虻，随时随地整天总是紧粘着你们，唤醒你们，劝导你们，责备你们。”他承认，被叫醒的雅典人无疑会感到恼火，心想如果杀了他还可再去睡觉，真的，他们会再次睡大觉，除非神出于关心，再派一只牛虻来给他们。

苏格拉底也许是出于讽刺，常常表示他不参与政治是想避开被清洗的危险。他知道归根到底搞政治是要冒风险的，从自己微妙和间接的参政活动中也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他虽没有直接投身政界，但却经常不断参与改革运动，间接决定公私活动的思想和方式。他偶然参加公众事务也有过两次（他在《申辩篇》中告诉我们的）：一次是，作为本部落的议员，他不得不主持对几位将军的审讯，因为他们在阿京努塞战役之后，没有收拾阵亡者的尸体；他在一个机构里反对民主派要对这几个将军进行非法审讯的提议。另一次，还是这件事，到了三十僭主专政时代，僭主们要求把那个萨拉米斯人莱昂将军从萨拉米斯解回来受审，同苏格拉底一道受命处理此事的其他四位议员都被迫同意

了，但他就是不同意。如果不是三十僭主正好在那时下台，他也许早就被他们处死了。为了公众的利益，他不惜冒死的危险。但他认为替雅典人服务更重大的职责和较安全的机会不是政治，而是应当经常唤醒自己周围的公民，让他们认真检察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因此要不断激励他们去尊重美德，用深刻的问题开导他们，使他们乐于过“受考查的生活”。

苏格拉底对这个使命从内心感到自豪，并且认为，正如他毫不迟疑地告诉法官们，他有功于国家，就是由公家来供奉膳食也当之无愧，他为公家的服务，如所记述，自己是一无好处的，因为他没有索取报酬。他一贫如洗就是明证^④。

苏格拉底用肯定相反的事实来反驳对他的控告。他根本不是腐蚀青年。他告诉他们——还有他们的长者——受考查的生活包含些什么内容。他非但不是什么不信神，而是继续在按神的命令执行任务。他说：“现在神把追问别人的任务交给了我，神一直在用传布神谕、显灵以及一切其他暗示神的意志的办法在通知我。”他要求人们亲眼看一看这样的事实：不仅所谓的被腐蚀者，就连他们的家长和亲戚都准备出庭来为他洗清罪名。

有迹象表明苏格拉底几乎是故意造成对自己的判刑的。似乎他感到神的征兆在警告他不要打乱他的生活会成为全人类榜样的进程。他并不争取陪审员的同情。好象就是在他光明磊落的胸怀深处，就深远的意义说，他体会到